

论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提出与退场

孙莹

(温州大学平阳学区, 浙江温州 325400)

摘要: 1929年6月, 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上制定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 正式提出“三民主义文学”的口号。上述文艺政策和文学口号的提出表面看来是为了对付左翼文学, 完全是出于政党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 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影响, 是国民党建国方略在文艺领域的实践。三民主义文艺政策及其文学运动, 作为一种政策意向虽然在短短两年内就偃旗息鼓, 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但却成为近代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开始。

关键词: 国民党; 三民主义; 文艺政策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3-0045-06

长期以来, 在文学史研究中, 国民党政府1928年初步统一全国到1949年败退台湾之前所制定、推行的文艺政策以及发起的文学运动, 都被忽略了。即使被提到, 也总是被当作与左翼文学相对立的部分进行否定和批判。众所周知, 文学研究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语境, 上述带有历史决定论的文学研究模式, 无疑窄化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实际上, 在这二十多年里, 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和文学运动虽然缺乏一贯性和连续性, 而且在同一阵营里的各文学团体之间也存在诸多分歧甚至斗争, 但是其基本立场和倾向还是比较一致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国民党早期提出的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分析, 探究其背后深刻的政治原因和影响, 以便使我们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状况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提出的政治背景

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提出首先受到国民党训政统治的政治背景的影响。1928年, 国民党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中国。南京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央政府的地位得到了确立后, 便宣布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接着, 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计划和政策。在推出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整顿措施的同时, 国民党政府也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干预与控制, 具体表现为: 确立了三民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一统的地位, 竭力推行“一个主义”的政策, 对于和三民主义不相容的思想学说一概予以排斥, 对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者以反革命罪论处; 确定三民主义为国民教育的宗旨, 在教育领域实行党化教育; 控制出版言论自由, 加强对宣传品的审查工作等。上述措施在客观上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干预和控制, 也明显表现出当时国民党进行“训政”统治的极权主义色彩。

除了受到国民党训政统治的政治背景影响外, 左翼革命普罗文学的蓬勃兴起也是三民主义文

收稿日期: 2006-09-21

作者简介: 孙莹(1979-), 女, 江苏徐州人, 助教, 研究方向: 中国当代小说

艺政策被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因。1928年1月,全部由共产党员作家组成的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同时,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创造社的刊物《创造月刊》第1卷第8号也发生“突变”。这些左翼文学社团共同倡导“革命文学”,宣称“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代替他们而起的”必定是“无产阶级文艺”^[1]。他们以激进的姿态全面批判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白话新文学,倡导发动了颇有声势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公开主张文艺的阶级性,要求文学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为意识,描写和反映无产阶级的生活和理想。

“革命文学”的口号一经提出,就立即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学论战。像《语丝》、《小说月报》和《新月》等在当时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刊物都卷入了这场论战。尽管这场论战由于各方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加上各方的门户和意气之争,并没有达到一定的理论水准,但却在客观上扩大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更引人注意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论争之后,左翼作家联合了起来,并于1930年3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系列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了一种威胁。国民党惊呼这是共产党的“文化暴动”,并体会到他们对文学领域的引导和控制,远不如共产党意识形态有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也开始重视文艺的宣传作用。国民党内的一些文艺人士在思想文化领域要求党治文化、党治文学的呼声开始出现。他们寄希望于制定自己的文艺政策,制造一种压倒一切的宣传声势,从而将左翼文艺消灭于无形。

从1928年下半年起,在国民党所掌握的一些报刊(如上海的《民国日报》的“清白之园”和“觉悟”副刊,南京《中央日报》的“大道”和“青白”两个副刊)上,陆续出现了一批鼓吹三民主义的文章,它们猛烈批判普罗文学,公开宣言打倒“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学”^[2]强烈要求必须把文艺纳入到三民主义的思想轨道上来。

同时,国民党政府也迫切感到必须在文艺战线上应对和打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积极扶植三民主义作为思想指导的本党文艺。

1929年6月3日到7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宣传部长叶楚傖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宣传会议。会议检讨了国民党以往宣传工作的缺陷,认为以往的宣传“散漫而不统一”,也回应了国民党内要求制定本党文艺政策的呼声,做出如下决定:第一,今后要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如发扬民族精神、阐发民治思想,促进民生建设等艺术作品);第二,要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艺术作品(如斫丧民族生命,反映封建思想,鼓吹阶级斗争等艺术作品)。会议还明确规定:将扶植“三民主义文艺”为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并通过了一项艺术宣传案,要求各省、特别市和县党部遴选有艺术修养之同志若干人,组织艺术宣传委员会,根据国民党党之文艺政策,举办文艺刊物等。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就这样被制定了出来。

二、三民主义文艺政策退场的原因

尽管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被确定为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但它却在短短两年内就偃旗息鼓。造成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以失败收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国民党政府自身对文艺宣传的不重视。虽然国民党制定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但并没有真正花力气从事三民主义文艺活动。提倡三民主义文学的多半是国民党的中下层党员,国民党高层特别是实权派领袖对此缺乏热情,因为他们要忙于应付党内各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军阀势力,无暇注意文学。以1929年6月的全国宣传会议为例,尽管这次会议在召开时间上长达五天,

国民党实权派人物蒋介石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国民党政务的主要负责人胡汉民也先后到会训词，但这次会议并没有制定出具体的执行方案。虽然在这次会议通过的“规定艺术宣传案”中规定：“中央对于三民主义之艺术作品应加以奖励”，由宣传部出钱，对成绩优异的各省市县党部、宣传部“应予经济上之补助”，但实际上并没有为这些部门提供必要的人员配备和固定的资金保障，这也使得创造三民主义文学最终成了空谈。以前期鼓吹三民主义文艺最卖力上海《民国日报》的“青白之园”为例，竟然因“报馆要加增新闻的篇幅”而被迫于1929年9月18日停刊，前后共计只出版37期。

缺乏国民党实力派，特别是蒋介石的支持，也是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以失败收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在1929年6月国民党宣传部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上，蒋介石曾经亲临会场训话，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并不真正热心于三民主义文艺。

从某种意义上讲，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是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盗用、篡改而来的，孙中山逝世不久，国民党内众多派系和集团的分化与斗争便迅速浮出水面，虽然他们之间纷争不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而都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于是三民主义成为了国民党当局形式上统摄全国包括文艺战线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对于国民党内的各派系来说，这只是一种标榜而已，对于蒋介石而言尤其是如此。

事实上，蒋介石口头上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但实际上他对三民主义并不真正信奉。这一点和他的知识背景和代表的阶级立场有关。蒋介石从5岁开始读《三字经》、《孝经》，直至19岁已较系统地学习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接受了儒家正规教育的严格训练。可以说，儒家思想在他的脑海中已潜移默化地扎下了根，而且对他日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青年时期的他在萌发“救国”思想的同时，产生了从军报国的志向。为此，他曾到亚洲最现代化的日本去学习军事。日本的军事专制主义思想对他颇有影响。以上的双重知识背景，使得他在思想上成为一个独裁者。在1931年5月5日的《致国民会议开幕词》中，他对“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大加贬低，并认为民治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尽管没有明确反对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但反对民主、主张对内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对于民生主义，作为统治者的蒋介石，从维护其统治秩序来考虑是不可能完全不关注民生问题的。从他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学说》和1953年出版的《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两部著作来看，他曾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作过一些阐发和补充。由于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党，蒋介石不可能触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他坚决反对用暴力平分土地。

对于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蒋介石是信奉的。不过，他信奉的不是孙中山的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平等型民族主义，而是所谓较有“效能”的、法西斯式的、主张对内独裁的民族主义。

从蒋介石对三民主义文艺政策和三民主义的口是心非来看，蒋介石热心的是剥夺其他党派和人民的文艺创作和发表的权利。那么，为何当时国民党还要提倡三民主义文艺政策呢？这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政治纲领影响的结果，是国民党政治惯性运动的结果。当时国民党要么不对文艺的政治内容公开提出要求，如果要公开提出要求，那就只能以三民主义为标准。因为孙中山虽然已经逝世，蒋介石虽然已经掌握了国民党的实权，但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为国民党制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而孙中山在当时的中国人民心中，尤其在国民党党内，依然具有最高的政治威望，包括蒋

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人,是不敢公开反对或者公开抛弃三民主义的。而且三民主义又被许多国民党人认为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主义,也是很难被认可的。因而,没有特别理由,蒋介石不敢公开以其中的一民主义代替整体的三民主义。再者,蒋介石虽然是实权派,掌握着国民党的最大的军权,但相对于国民党的一些元老而言,他的政治资历当时并不算高。在当时复杂尖锐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下,为了获得较多的政治上的支持,他对一些国民党元老的意见表面上还是要尊重的,所以在最初制定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时,蒋介石只得以“三民主义文艺政策”而非其他名词命名。

国民党在1929年6月制定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但随着1930年前后国内政治形式的变化,蒋介石发现与“三民主义文艺政策”这个称号相比,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号对他更有利。因此,第二年6月,国民党的实权派——蒋陈派又暗中支持发动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作为孙中山思想影响和国民党政治惯性运动的结果的三民主义文艺政策,在体现国民党实权派政治意志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遮掩下,最终逐渐被淡忘。

其次,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既没能发动起对文坛形成强烈冲击的文艺运动,也没有产生出相当水准和数量三民主义的文艺作品。要执行三民主义文艺政策,首先要确立三民主义文艺理论,用它来统一国民党文艺界的思想,结成大规模的文艺阵线,切实发动起三民主义文学运动。然而,究竟应该如何建立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呢?国民党对此束手无策。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傖虽然再三强调“建设三民主义之文艺乃是目前至为重要的工作”,但是对于怎样去建设,他也没有明确解释,只是说:“要以三民主义之思想为思想,思想统一以后,三民主义的文艺自然会产生了”。^[3]这样的理论逻辑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使得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从一开始就遭到左翼文学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的两面攻击。国民党宣传会议刚刚把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确定为本党之文艺政策”,梁实秋就提出强烈反对,他认为“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用政治上的一种主义来统一文艺就更其不可能”。^[4]由于缺乏理论基础和概念的模糊不清,提倡三民主义文艺的国民党人士既无法反驳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的疑问,更无法解答普罗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垄断整个中国文坛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根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这就使得他们对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宣传仅仅只能停留在喊口号式的鼓噪。

同时,三民主义文学也没有贡献出相当水准和数量的作品,除了朱公仆的独幕剧《星夜》和鲁觉悟的小说《杜鹃啼倦柳花飞》以外,就再没有象样的三民主义文学作品了。即使是这两部作品,在对时代状况的揭示能力与回应能力等方面,和象征新的社会力量崛起的普罗文学也相距甚远。可以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创作上,三民主义文学都没有对文坛产生多大影响。

最后,导致三民主义文艺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它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缺少精神吸引力,更无法彻底解决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它用来命名的“三民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着内在的缺陷:

三民主义只是一些信条和纲领的松散结合,缺少统帅整合其内容的核心价值,没能形成精密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因其内容庞杂,包含的多元价值自身也有冲突。国民党党员各派又都想以三民主义思想正统自居,却又对其理解得模糊不清。这造成了国民党只能提出三民主义文艺政策这个口号,却对这一概念解释不清,更提不出有说服力和理论深度的文学主张。

三民主义缺少超越性的精神价值指向。尽管它强调民族、民权、民生同等重要,但从孙中山的论述方式上看,民族主义显然是被放在第一位的,而民权并没有充分得到重视和肯定。孙中山

虽然反复宣扬主权在民，但事实上他又不相信人民具备行使基本政治权力的能力。他提出的人民享有政权，政府行使治权的模式在中国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很容易变成带有极权主义倾向的独裁专制。仅此一点，三民主义在政治动员力上就远逊于共产主义。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普罗文学，当然要比宣扬三民主义的三民主义文艺，更能获得大众的支持。

它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偏于保守。三民主义一方面对封建政治制度持彻底否定批判态度，主张采用西方的现代政体，可另一方面却又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道德伦理留恋不舍。孙中山坚定地认为三民主义“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5]，其精神资源来自传统儒家思想。尽管三民主义强调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优越性，使其获得了当时社会上保守势力的支持，但这种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保守性与时代的发展是相背离的。三民主义思想和以“三民主义”命名的国民党文艺政策，显然无法吸引经受“五四”新思想洗礼的青年一代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三民主义文艺政策及其文学运动，尽管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无成果，但它却成了国民党在文艺领域获取话语霸权的一种话语策略。

当时国民党独霸政权，实行“党外无党”、“以党治国”的政治专制主义。为了抵制其他党派和人民通过包括文艺在内的各种话语方式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实行专制主义，剥夺其他党派和人民的话语权利。这就需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政治话语标准，以便以此标准决定话语是否被禁止。于是，“创造三民主义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就成了他们在文艺领域实行专制主义的一种话语标准。由于没有一个独立的第三者来仲裁，这个标准的解释权仍然在国民党手中。有了这样一个政策，国民党就有了控制文艺、剥夺人民文艺创作自由权利的政策根据，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宰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事实上，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实施确实对左翼文艺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此，“左联”期刊《文化斗争》创刊号上发表了潘汉年的文章曾予以揭露：“我们看一看事实吧！代表反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一切自由刊物，差不多都遭封闭。上海市党部与社会局更巧妙了，一面强迫各书店不准再印行各左翼书报，同时命令书店老板，保留《大众》，《拓荒者》，《南国》等左翼刊物的名称，由他们派民族主义的文学家来编辑民族主义的内容代替这些杂志的真面目，这一种下流无耻的欺骗手段，虽未经书店老板采纳，可是反动文化集团的日趋法西斯化是很明显的了。”^[6]

三、结 语

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提出，是政党意识形态有意识、有目的地全面介入文学领域的开始。自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全面抵抗。从此，政治意识形态化开始使文学领域逐步演变成政治生活、斗争的一部分。在此影响下，“五四”文学单纯的思想启蒙时代终结，近代文学的性质彻底发生了转变。

参考文献

- [1] 郭沫若. 英雄树[J]. 创造月刊, 1928, 1(8): 4-6.
- [2] 张道藩. 我们需要的文艺政策[N]. 民国日报, 1930-11-26(1).
- [3] 叶楚傖. 三民主义的文艺创造[J]. 中央日报, 1930, 元旦增刊: 31-33.
- [4] 梁实秋. 论思想统一[J]. 新月, 1929, 2(3): 6-8.

- [5]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532.
[6] 潘汉年. 本刊出版的意义及其使命[J]. 文化斗争, 1930, 1(1): 12-13.

On Proposal and Turndown of the Literature-and-art Policy of Kuomintang'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SUN Ying

(Pingyang Campu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400)

Abstract: Kuomintang proposed the literature watchword of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t a conference of propagation in June, 1929 and formulated the related literature-and-art policy correspondingly. Superficially, it was established against the Leftist Literature ideologically, while physically it in a sense originated from Sun Yat-Sen'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hence the literary expression of Kuomintang' constructive scheme. Although the involved literature-and-art policy and the concerned literary movement died only two years from its birth, with faint impact left, it paved the way for the modern literary ideology.

Key words: Kuomintang;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Literature-and-art policy

(编辑: 刘慧青)